國際戰略研究 簡報

2021年12月9日

第118期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第八届“北阁对话”嘉宾观点综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曾楚媛、赵建伟

北京大学第八届“北阁对话”于2021年11月3至4日在北京大学北阁举行。本届对话以“新冠肺炎危机后的全球趋势和政策建议”为主题，邀请了二十余位中外前政要和知名专家学者与会，以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中国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全程听取了会议并做主旨发言。现将与会嘉宾观点总结如下。

一、新冠疫情的冲击和回应

多位参会者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国际关系、人类生活方式等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国际机构和许多国家的回应乏力。也有参会者表示，在某些方面，人类社会和一些国家对疫情反应过度。参会者一致认为，未来各国应吸取教训，展开深度合作，以整体性方法处理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

有中方参会者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第一，新冠疫情及其在全球的传播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第二，疫情严重影响世界经济，重塑全球供应链。第三，疫情成为加剧地缘政治竞争的催化剂，对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导致未来世界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第四，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人口危机、能源危机、互联网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地缘政治紧张一起向人类逼近，带来一个充满挑战的全新世界。

有外方参会者同意新冠疫情对经济和人类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的观点，并从其他方面分析了疫情的冲击。第一，新冠疫情使得美国与中国、美国与西方国家

之间的竞争态势变得更加严峻。第二，新冠病毒导致不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成为焦点。第三，疫情引发“新冠病毒民族主义”的上升，并产生负面后果。第四，“病毒民族主义”转化为“疫苗民族主义”，其结果是不同国家以彼此竞争的方式分发疫苗。第五，疫情对国际机构造成损害。第六，疫苗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国际机构效力的下降，导致国家的权力得到增强。第七，疫情截断了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破坏了人们之间相互认知的能力，还助长了国家之间的猜疑。第八，中国可能是联合国成员国中唯一推行全面防控的国家，这将对其他国家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中方参会者指出，人类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这意味着我们在处理这个系统中的事态时，不可能将区域内的事态与整个世界各种力量隔离开，我们应采取整体性安全措施。然而，国际社会尚未就这一思路达成一致意见。我们还面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等领域安全化增强的趋势。过度安全化也导致科技民族主义上升、意识形态竞争加剧和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有外方参会者指出，新冠病毒并没有那么致命，在某些方面，人类社会对疫情反应过度。新冠疫情把世界分成两个宇宙。一个是中国宇宙，一个是中国之外的宇宙。在中国宇宙里，中国建造起了长城。只有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国人的同质性很高，但中国的体制无法在中国文化范围之外运作。由于中国处在一个独立的宇宙中，它将是这场危机的大赢家。新冠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中国越有利，对全球体系则越不利，因为疫情会造成不稳定。在现有局势下，我们要防止出现社会动荡。

关于如何有效回应疫情的冲击，参会者从多个角度提出应对思路。第一，国际社会需要制定清晰的指导方针，培育真正的多边主义。第二，从过去两年中吸取教训，将疫苗开发和分配纳入全球合作，公平快速地分配疫苗。第三，病毒突变、气候变化、全球债务管理、全球公共产品仍然应该成为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中美关系不能仅仅为战略竞争所主导。第四，各国应以人民为中心，保障旅行者在入境前后的健康。第五，尽快恢复主要国家卫生机构在工作层面的接触。第六，必须对高涨的技术民族主义进行降级处理，为恢复疫苗及制药界团体（包括开发者、研究机构、大学）之间的合作腾出空间。第七，迫切需要就“总体安全”达成新的定义，不能再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视为分开的领域，而应视为一个整体。

二、中美矛盾下的亚太地区战略格局

参会者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恶化深刻影响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走向，该地区多数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参会者就如何改善中美关系及建设开放的亚太安

全秩序提出诸多见解。

一位外方参会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扩大了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趋势。中国是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心，然而从政治、技术和军事实力的分配来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亚太地区经济力量分配和政治、军事、科技力量分配之间的不对称导致了该地区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亚洲大部分国家都是修正主义者。

亚太地区特有的形势与中国的崛起，导致地区内多个热点的紧张局势加剧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竞争。虽然中美竞争令人担忧，但它不是亚洲局势紧张的唯一驱动力。即使中美竞争消失，亚洲的热点和争端仍会存在。中国崛起还造成该地区非正式联盟的形成。这些联盟最初是为了对冲和发出信号，但正变得更具结构性。值得一提的是，亚太地区没有处于两极冷战或多极格局，而是处于秩序转换之中。

亚太地区的复杂性还体现在中印关系上。与以往的情况不同，中印双方在边境问题上的和解更加困难。不过，尽管中印边境局势堪忧，双边政治关系脆弱，中印贸易却蓬勃发展。因此，亚太地区最有可能面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的局面，但竞争的比重越来越大。

亚太地区的走向面临两大未知数。一是中国的发展轨迹。中国是一个对未来有着明确规划的大国，但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成功实施规划的前景堪忧。二是中美关系。至少在未来 10 年，中美面临一场竞争，但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在防止第三方挑战者崛起方面也有共同利益。亚洲不会发生大国战争，但是其他形式的冲突、暴力和竞争将会增加。亚洲应当建立更加多极、开放、可预测的安全秩序，建设基于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避免形成僵化的军事联盟。否则，结局将十分糟糕。

一位中方专家指出，受中美关系恶化影响，亚太地区安全格局出现四个明显的变化：第一，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出现新一轮力量的组合，包括美国强化联盟体系及建立新的联盟机制，中国加强与俄罗斯等国家的关系。这些动向可能会推动地区安全架构趋于两极化而不是多极化。第二，在中美合作缺失的情况下，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很难有所建树。第三，不少国家做出加强自身防卫能力的选择，有可能会地区军备竞赛。第四，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积极组织支持台湾的国际联合阵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军事冲突导火索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一位外方参会者认为，中美双方领导人应亲自出面，降低发生意外冲突的可能。除视频会议外，双方还应当进行面对面的会晤。此外，中方应当了解当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的新著《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与前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柯伯吉（Elbridge A. Colby）的新书《拒止战略》等文献，正在影响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在影

响华盛顿的对华政策。

一位中方参会者指出，亚太地缘战略格局的演变同中美关系息息相关。中美关系和亚太地缘战略格局再一次面临新的选择和两种不同的前景：是以“零和竞争”还是以“合作共赢”来定义中美关系？是“建立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小集团”还是“构建地区利益共同体”？中国的基本理念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影响许多美国人做出选择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能不能接受和尊重中国人民已经选定的执政党和国家发展道路，能不能接受和尊重一个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种族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得到应有的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美方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中方的愿景是“和而不同”，路径是“斗而不破”。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形象代表中国外交官，中国经典文学著作《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十分合适。他善恶分明、正义感强；既有硬实力，也有软实力；他降妖除魔，不是为了自己称王称霸，而是为了帮助唐僧取得造福人间的真经。当年毛泽东曾经写诗，“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提倡他的这种精神。希望中美两国人民一起努力，扫除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上空的“雾霾”，开辟一个明朗的前景。

有外方参会者指出，竞争可能是中美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因素，但只要竞争能带来创新和持续繁荣，无需害怕竞争。拜登似乎在寻求“没有灾难的竞争”，试图在符合共同利益的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未来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切实可行的平等关系模式。包括韩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都不想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

中韩两国均提出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有助于经济一体化高标准的扩散，也将加速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然而，拜登政府的立场尚不明确，政治而非经济因素是决定拜登政府是否加入CPTPP的原因。

尽管面临经济困难，但朝鲜仍在继续开发导弹与核能力，同时拒绝与文在寅政府及拜登政府对话。从朝鲜以往的行为看，实现对话的前景并不明朗。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

有中方参会者从中国和美国的国内形势及中美关系三个层面阐述观点。首先，中国的方针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共同富裕。中国的发展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要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上，切实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方愿意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一切有益的经验。

其次，最近一些年，美国国内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种种矛盾积累并激化。美国国内有人认为，种种危机正在挑战美国百年繁荣的社会根基，甚至预感几年之后美国还会爆发更大的危机。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难以确定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强大还能持续多久。美国到底怎么了？这值得深入研究。

最后，中美关系陷入几十年来最困难的局面。处理好中美关系，归根到底，要认清世界大势，顺应世界潮流。最近二三十年来，世界发生重大深刻的变化，人们不愿意看到任何霸权国家再现。国际形势演变到今天，很难再回到彼此对立、对峙、对抗的阵营化局面，反分裂、反脱钩的不结盟意识在强化。中方乐见美国继续繁荣发展，但坚决反对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决反对美国阻挡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统一。如果真正的核心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中美关系有望走上长期共处、相互尊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轨道，这对全世界持久的和平繁荣稳定至关重要。

在讨论环节，参会者就近期共和党人扬金（Glenn Youngkin）赢得弗吉尼亚州长选举与特朗普三年后回归白宫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美方参会者一致认为，扬金主张与特朗普保持距离，他的胜选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本人取得某种胜利，也不应被看作是特朗普未来回归的征兆。

对于韩国和中国加入 CPTPP 的动机，有外方参会者回应称，韩国不愿被排除在 CPTPP 成员国的供应链之外是原因之一。有中方学者指出，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不是外国媒体经常描述的所谓“战术”，而是可以理解为一种有助于深化国内各领域改革的工具。另一位中方参会者则指出，虽然中国现在离 CPTPP 的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但是中国愿意加入，并且已经在内部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向 CPTPP 的标准靠拢，这表现了一种政治态度，说明改革开放的国策并没有改变，中国更不会借疫情来关闭大门。

对于如何定义中美关系，有外方学者指出，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形成共识，美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交叉碰撞的风险。我们不应把中美关系看作“新冷战”，而应视为“合作式竞争”关系。除举行高层会晤外，双方还应保持其他层次的接触。有中方学者谈到，中方拒绝接受美国从竞争的角度定义中美关系，包括“合作式竞争”“没有灾难的竞争”“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等各种表述，未来中美关系怎么走，值得密切关注。一位中方参会者指出，中美两国需要进行更多深入和实质性的沟通，在此基础上，双方才能找到准确的措辞描述两国关系的发展。因此，真正值得关心的不是如何定义中美关系，而是其实质内容。另一位中方参会者指出，不能用一种简单的定义去形容中美关系。如果一定要定义的话，应该从多个方面去定义。总之，最重要的是双方要做一些具体事情，特别是在符合双方利益的问题上，更多地寻求合作；在双

方有矛盾、甚至敌对的领域，摸索出一种解决办法，切实管控好分歧。

三、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治理

参会者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严重性已形成共识，气候变化将对地理、生态、能源、经济等造成破坏性后果。与会者对相关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既有成果表示肯定，同时就各国履行减碳承诺、气候变化的结构性问题、气候平等与公正、发展金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客观的探讨。各方的共同观点是，只有取得全球共识、推进全球合作，在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上的治理方可取得真正进展。

有外方参会者谈到，气候治理对安全与地缘政治产生影响，地缘政治也可能影响或阻碍气候治理。气候变化已成为冲突倍增器，气候治理缺失可能引发内外冲突。在中美之外，还要看到发展中国家间、政府与非国家行为体间的分歧。气候治理需要国家方案，也需要全球合作，这要求对政治与气候变化的关联进行持续、全面的讨论。

一名中方学者认为，在全球层面，有美国回归《巴黎协定》、各国陆续宣布碳中和目标、国家自主贡献（NDC）和可再生能源上的进展等喜讯，但气候变暖已成全球危机而国际社会治理行动不足，应建构中美欧全球气候治理联合领导。在双边层面，中美表达了进行气候合作的强烈愿望，但双边战略环境未能为合作提供良好动力；中美应停止相互指责，将气候合作制度化并加强次国家层面合作。在国内层面，中国在气候治理上有雄心、有成果，但仍需加强国内协调。

有外方学者表示未来十年气候变化的发展不容乐观。气候变化与人类灾难、地理变迁形成负面反馈效应，甚至引发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气候是显而易见的公共物品，但各国气候治理能力存在差异；对以集体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后果的迫切性，国际社会的理解存在差异，且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划分和补偿上存在争议。欧洲将以牺牲其经济竞争力、影响贸易政治为代价，严格执行减碳目标；对中美来说，严肃承诺、提高互信、减少冲突是促进两国气候合作的前提。

有中方学者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提出对气候变化的看法。他认为，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问题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贫富分化、全球化动力减弱、民族主义上升一并构成了全球性的五大挑战。世界各国在这些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应关切如何促进对话、加深理解、求同存异，对受到忽略、缺少代言的地区应倾注更多的关心。中美在各问题领域的战略竞争受到过分渲染，其重要性被过分拔高，两国间实际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被放大。因此，应有分寸地看待中美矛盾对气候议题的影响，并对此进行准确评估。

还有外方参会者认为，气候变化的影响普遍且复杂，国内政治影响各国气候政策的制定。必须转向新的贸易、产业和能源结构，形成气候政策与自然保护的互相促进。碳排放大国应深化其净零排放承诺，加大对低碳技术研究、应用、转移的投资；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期望中美在气候和其他领域加强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讨论环节，外方学者主要指出：（1）气候危机的政治性是当前重要挑战，中美竞争会否阻碍国际气候合作是中心议题；（2）建议中国和欧洲进行气候合作，非国家行为体和地方层面积极参与气候治理；（3）对气候补偿议题的过多关注可能会拖延气候治理目标实现的进度。

四、变化中的亚欧大陆战略格局

各方学者就亚欧大陆的整体格局变化和重点议题展开讨论，主要谈到地区大国间的对抗与竞争、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停滞、中美紧张关系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地缘政治后果，涉及地理范围包括欧洲、中东、中亚、南亚和亚太地区。与会者一致认同，地区内各利益攸关方十分重视中美两国对本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力。

一名中方学者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之一，会对中亚产生直接影响，也可能对亚欧其他地区产生间接影响。亚欧大陆权力结构复杂且分裂，地区主要大国间冲突深化。例如，中欧在敏感议题上的冲突或将影响双方未来的合作，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关系出现恶化，中印边境纠纷在短期内未能找到解决方案，土耳其与多方关系面临挑战，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可能出现更多冲突。总体而言，该地区冲突的深化将可能持续较长时间，至少将贯穿拜登总统的整个任期。近期，停滞与碎片化将成为亚欧区域合作的普遍趋势；除欧盟以外，多边主义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双边主义势头上升，未来五年内地区合作将呈现更多挑战。

有外方学者提出，过去一年，亚欧大陆发展的延续性大于其变化。美国作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将继续对北京和莫斯科实施“双遏制政策”。区别在于，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将俄视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刺激因素。美国试图重振其联盟体系，欧盟与北约负责应对俄罗斯，美英澳联盟（AUKUS）、美日印澳四国集团（QUAD）和五眼联盟（FVEY）负责遏制和威慑中国。然而，美国难以在本地地区实现双边战略关系与民主联盟间的平衡。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越南对美国的民主联盟构成挑战。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 2021 年亚欧大陆最为重要的变化，阿富汗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亚欧政治一体化的未来，而中印关系的未来对该地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有中方学者认为，拜登政府试图结合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之所长，而这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目前中东地区存在四个重要现实：第一，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尤其是军事存在）正逐步下降；第二，地区联盟将更为活跃，伊朗阵营、土耳其—卡塔尔阵营及以色列—阿联酋阵营间战略竞争激烈；第三，伊斯兰主义对该地区很大一部分人仍具相当的吸引力，伊斯兰非国家行为体将更为活跃；第四，中东与南亚间互动强度有所上升，相关新现象的出现将对欧亚地缘战略产生重要影响。此外，阿富汗仍是一个巨大的变数与挑战，地区大国应在阿富汗问题上进行合作。

一名外方学者指出，中美力量的平衡是亚欧地缘政治管控中最重要一环。中美是“合作性对抗”关系，以“修昔底德陷阱”比喻中美关系是错误的，美国无法控制中国的崛起，但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可以调整其对中国的过度恐惧，“新冷战”思维并不可取。要对中美进行正确的实力评估，要认识到经济增长势头是中国的“资产”，而人口问题和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则是其“负资产”；美国虽正面临严重的国内政治挑战，但其地理、人口、能源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和其强大的社会韧性不可小觑。中国不应误认为美国正在衰落，美国则不应夸大中国的实力；尤其在民族主义盛行的今天，上述两种错误知觉非常危险。他呼吁管控中美地缘政治平衡，维护亚欧大陆与全球稳定，并加大对全球公共物品的关注。有中方学者回应，同意应对中美力量对比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防止误判，但同时也指出，当前中美对彼此意图的评估也值得关注。

在讨论环节，有外方学者指出，需警惕“金德尔伯格陷阱”，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之覆辙。有亚洲学者指出，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对连接该地区及维护亚欧大陆相对和平有重要意义；西方应以更全面的视角看待伊朗，予以更多尊重与更好的外交。一名中方学者认为，中亚国家不偏向任何一方，希望在中国、俄罗斯、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找寻平衡。还有中方学者呼应外方学者的观点，强调中美之间的错误知觉十分危险。

最后，有中方学者总结，要清醒认识到，应对新冠疫情、中美关系、亚太安全、气候变化、欧亚大陆的传统和非传统问题等挑战，并非一日之功，还需要各方付出许多努力。

编辑：崔志楠 审核：王缉思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北阁

邮编：100871

网址：www.iiss.pku.edu.cn

电话：+86-10-62756376

传真：+86-10-62753063

邮件地址：iiss@pku.edu.cn